“龙”与“Dragon”之辩: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秦　晨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回顾了“改龙”之说引发的辩论,分析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概念。对于是否“改龙”这一学术命题的结论是:这两个概念虽非对等,但并不妨碍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知,“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修正乃至废弃龙的形象则更属削足适履之举,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必要的跨文化知识积累和开放、宽容、理性的态度。

关键词:中国龙;西方龙;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8)04-0080-03

据多家媒体报道,有学者指出: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因为“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会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这则报道立刻激起了巨大反响。报道、民调纷纷出炉。与其说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讨论,还不如说是一场一边倒的质疑和讨伐。所有的调查结果惊人一致:反对“弃龙说”的人数均超过90%。随后,又有其他学者在其博客上撰文,认为龙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是封建专制的符号:“既然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崇拜它?”这篇博文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对,传统媒体亦纷纷报道。

那么,中国人心目中的“龙”究竟是什么?西方的“dragon”又是什么?在抛出观点之前,概念的厘清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一、中国之“龙”

一项学术研究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以至于成为公共话题,自然是由于“龙”这一概念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任何对它重新解读的意图都可能牵扯国人的神经。然而,要真正了解龙、理解龙,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遮蔽我们寻求真相的眼睛;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思维方式也只能提供片面的视角。从蒙昧的初民时代到今日中国,龙的形象和内涵是多维度建构的结果。

1.神格之龙

远古时期,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华夏先民将希望、恐惧、敬畏、祈求等人类心理融入云气雨雷等天气现象,虚构出一种有生命的“灵物”,即为“龙”。因此,最初的龙是神格化的自然,或曰巫术意象。在《周易》中,“龙”首先是中华古人所创造的用以进行占卜的卦象。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乾卦记载了龙从潜到现、从跃到飞的过程[1]。

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龙由巫术意象演变为多个原始氏族的图腾[2]。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组成炎黄部落联盟,共同构成华夏族团的主体——汉民族之后,出于巩固联盟的需要,全民族共同的标志和象征应运而生。在综合各部落图腾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龙的形象。“龙”实现了从氏族图腾向民族图腾的飞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之说得以成立。从此,龙正式进入了华夏文明的殿堂。呼风唤雨的灵性和凝聚民族的力量使得龙这一虚构神物广泛而持久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龙的一切,经历国人年复一年的行动和言说,成为华夏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2.皇权之龙

进入帝国时代,为使百姓承认其统治合法性而灌输“君权神授”的帝王们,一方面自命为“真龙天子”,将自己定位成神性的“天”与人性的“民”之间的媒介;另一方面殚精竭虑地通过各种仪式和符号来强化这一定位。从史称“祖龙”的秦始皇起,龙便成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皇家建筑中,龙的形象无处不在;帝王之躯及皇室用具均被冠以龙名:“龙体”、“龙

收稿日期:2007-11-29

作者简介:秦晨(1971—),女,江苏仪征人,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应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

颜”、“龙袍”、“龙旗”、“龙辇”、“龙舟”……不胜枚举；帝王在位称“飞龙在天”，行走称“龙行虎步”，去世称“龙驭上宾”。种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见证了“龙”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岁月中浸染的皇权色彩。

3.人格之龙

龙在《说文解字》中被称为“灵虫之长”，所以这种神兽也常被用来比喻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中豪杰”。父母期盼儿女成才是为“望子成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则比附世外高人的行踪不定；“卧虎藏龙”是潜藏的优秀人才；“龙骧虎视”意指英雄人物胸怀大志。“龙腾虎跃”、“龙马精神”等词语更是普通百姓也可获得的赞誉和祝福。

4.天象之龙

有学者将龙崇拜的起源归结于古人观测天文的参照系统，即苍龙、朱鸟、白虎、玄武这“四象”之一的苍龙星象[3]。上古时代，龙星升降与春去秋来相吻合，故古人分别用升龙和降龙作为春、秋二时的象征。成为人文教化的一部分，并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而针对它的观象授时活动，也就从单纯的天文观测演变为庄严的政治仪式和宗教典礼。由此，龙星成为华夏初民敬奉的龙的原型。斗转星移，龙星慢慢地从人们视野中淡出了。然而，与龙有关的语言文字、民俗仪式一直流传至今。

当然，由于龙“诞生”于几无历史记录留存的远古时代，后人对龙的阐释不得不借助于神话传说及歧义从生的考古发现，龙的文化渊源至今尚未有定论，关于龙的言说亦是纵横交错、纷繁嘈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是积极的、正面的。虽然它曾被“封建专制”利用，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反专制的重点不在于反它的一个文化符号，而在于以古为镜，推进当下的制度建设，否则，即使主观上可以洗脱避重就轻之嫌，也不免于客观上陷入“荆轲刺孔子”的怪诞。

二、西方之“dragon”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dragon”的形象远非那么光彩，而是充满阴暗、凶险的意蕴。综合“牛津”、“朗文”、“韦氏”等权威词典的解释，“dragon”一词主要有两层涵义：①神话或儿童故事中的一种虚构动物，形似鳄鱼或蛇，有翼、爪和鳞，口能喷火；②凶恶的人，尤其是监管少女的严厉的女监护人。这样的“dragon”形象从何而来？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圣经文化中找到答案。

“dragon”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drakon”，意为“看守”。传说中的 dragon 是看守财宝的怪物，形似鳄鱼，有翼，口吐烈焰，生性凶残，令人生畏。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底比斯国王杀死看守泉水的恶龙之后，将其牙齿拔下播种到地里，那牙齿很快长出了一些武士，武士们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 5 人。英语中的“to sow dragon's teeth”（埋下争端的种子）即出自此典。

《圣经》中的“dragon”也是邪恶的象征。从《创世记》开始，上帝就注定了人类和爬虫类要做永远的敌人，其起因是蛇在伊甸园中扮演了一个诱惑者的角色。从此，这位撒旦的使者就必须永远用腹部行走，和人，尤其是女人，成为互相仇视的对象。《诗篇》、《以赛亚书》和《约伯记》都提到一条名为“利维坦”的恶龙，它是一只邪恶的海上怪兽。《启示录》（12，3-9）中对龙之残暴的描述在西方也是广为人知的。

弗雷泽在其文化人类学名著《金枝》中讲述了包括埃及、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广阔的西方世界中流传的种种关于“dragon”的神话传说[4]。总之，“dragon”也罢，与它形似的种种“dragon”原型也罢，它们在西方文明的舞台上，是作为阴暗、邪恶、危险而富有攻击性的怪物登场的。后世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和大众话语中，“dragon”似乎一直就是令人畏惧和憎恶的凶兽，哪里有半点中国龙的祥瑞气质？

三、对“改龙说”的几点质疑

无疑，将汉语中的“龙”译为英语中的“dragon”，只是看到了二者局部的形似而忽略了它们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误译，至少不是等值翻译。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和译者的眼界欠缺，此类语言现象比比皆是。许多非等值翻译因其被使用的长期性和广泛性也已约定俗成了。为何独独要对“龙”大动干戈呢？对此，“改龙”者的理由是，现在的中国龙形象会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此言一出，立刻招致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绝大多数的反对者只是简单、甚至粗暴地表达了民族义愤；“去个性化”的网络环境更助长了一些网友的不理智情绪。然而，激烈的情绪代替不了理智的学术争鸣。即使要反对，也应从学术的角度，运用事实，诉诸理性，方能越辩越明。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质疑“改龙”之说：

首先，西方人使用“dragon”一词指称中国龙，是否必然说明他们认为本族文化中的 dragon 与中国的龙是同一概念？普通词典上的释义因其简明扼要，往往脱离具体语境，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一旦出现较为清晰的语境，即所指是中国的“dragon”时，西方辞书的解释还是会依据中国概念的。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dragon”词条在概述西方之 dragon 之

后，以相当篇幅介绍了远东，尤其是中国的龙的形象，指出它是一种“仁慈的动物”[5]。《美国百科全书》亦在回顾《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恶龙”后，转而提出：“中国龙的形象与它们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的传统和艺术中，龙是力量、富饶和幸福的古老象征。”[6]有趣的是，两部“百科”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中国宋代画家的“九龙图”作为“dragon”条目的附图，而不是西方美术史上为数众多的屠龙之作。对于龙这一虚构神物，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专门工具书提供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如美国出版的一部权威宗教学百科全书将龙的形象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创世说和末世论中的龙”、“作为绑架者和毁灭者的龙”、“作为监管者的龙”、“作为敌人和魔鬼的龙”、“赋予富饶和生命的龙”以及“作为祖先的龙”。后两节的主要依据正是中国之龙[7]。

其实，大多数西方民众对于中国龙还是有所了解，至少是略知一二的，不至于将它等同于本族文化中的恶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舞龙表演，商业嗅觉灵敏的电影公司也不会认可李安导演的名片“卧虎藏龙”的英文名“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可见西方人对龙的误读并非有些专家设想的那么普遍。另一方面，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言，西方有人利用龙的文化差异而故意歪曲中国，散布“中国威胁论”，那应该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指望通过“改龙”来击败“别有用心者”，这种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了。

再者，现代社会又有哪个稍具常识的人会将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化符号作为了解一个民族现状的依据呢？美国之秃鹰，俄罗斯之北极熊……各国的象征性动物中不乏“负面形象”，倒也不妨碍它们继续作为国家象征。如果有人作出这样的推理：“龙是不好的。中国的象征是龙，中国人自称龙的子孙。所以，中国不好，中国人也不好。”这样的人或者是一直生活于闭塞环境以至于毫无跨文化知识或意识；或者是尚未有足够经验积累的儿童。然而，随着他们的眼界开阔和见识增长，当他们真正进入跨文化语境时，在纠正往日偏见的同时，这个小型的“文化诧异”正是关于跨文化交流的生动一课。我们的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促进他们的这个认识过程，告诉他们：我们的“dragon”和你们的不一样，而不是削足适履地“改龙”乃至“废龙”。

另外，有人提出以“龙”的汉语拼音“long”来代替英语中的“dragon”。比起龙的形象改造工程，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经济方便的做法。然而这是一个漠视语言发展规律的想当然的设想。语言从来就不适合自上而下的生硬推广，而是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发展。历史上已有过太多动机良好的语言工程（如世界语）以失败告终的例子。即使这一计划获得官方首肯，可以预见“long”一词只会出现在官方宣传或少数学者的文章中。它的目标人群——西方英语国家的人们——仍将继续使用“dragon”这个称谓。

Samovar 和 Porter 在论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人们总想在词语本身寻找意义，然而词语并不拥有意义。这个说法要准确得多：人拥有意义，而词语导出意义”[8]。“龙事件”呈现了这样的事实：英语词“dragon”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导出”了更多的意义。如果我们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响而忧心忡忡，那么，以中国的“龙”丰富西方的“dragon”，正是对这种令人忧心的“文化入超”的反动，何乐而不为呢？

总结这次论争，或许可以套用殷海光先生对长久以来中学西学之争的评价：“主张太多而分析太少，情感太强而理知太弱，前提还没弄清楚就抢先下结论，事理还未抓梳明白就作价值判断”[9]。被网络放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脚踏实地的研究。似乎“中国人”，或者说，“反对西方的中国人”这样的立场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化身。“龙”与“dragon”之辩既然是一个跨文化的学术命题，论战双方首先应该具备必要的跨文化知识，以开明宽容的态度和相对自由的立场，运用理性的分析判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改良也好，维持也罢，这些良好的动机并不必然导致相关理论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行性。至于通过质疑对方的动机来打压异己乃至进行人身攻击，则更加有违学术争鸣的原则了。

参考文献：

[1] 王振复. 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252-255.

[2] 庞进. 炎帝与龙文化[J]. 唐都学刊，2006(4)：126-129.

[3] 刘宗迪. 飞龙在天[J]. 读书，2005(4)：47-57.

[4] GASTER T H. The new golden bough[M]. New York：S. G. Philips, Inc., 1959：134.

[5] WARREN E.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fifteenth edition[K]. 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89.

[6] ALAN H.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K]. Danbury：Grolier Inc., 1983.

[7] ELIADE M.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K]. 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8] SAMOVAR L A, PORTER R 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fifth edition[M]. 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9]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